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 中国与东亚经济

—— 2009年中韩经济合作研讨会文集

陈东琪 主编 ©



中国计划出版社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 中国与东亚经济

——2009 年中韩经济合作研讨会文集

陈东琪 主编

中国计划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与东亚经济: 2009 年中韩经济合作研讨会文集/陈东琪主编.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80242 - 338 - 1

I. ①全… II. ①陈… III. ①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发展—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②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发展—东亚—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F12 - 53②F13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3018 号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

中国与东亚经济

——2009 年中韩经济合作研讨会文集

陈东琪 主编

☆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11 号国宏大厦 C 座 4 层)

(邮政编码: 100038 电话: 63906433 639063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880 × 1230 毫米 1/32 7.75 印张 194 千字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 - 7 - 80242 - 338 - 1

定价: 18.00 元

前 言

2000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韩期间，与韩国领导人就成立《中韩经济合作研究会》达成共识。2001年6月，韩国总理访华期间，中韩两国政府研究机构——原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和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共同签署了《中韩经济合作研究会》备忘录，两国总理出席了签字仪式。2002年5月13日，“中韩经济合作研究会”正式成立。按照机构设置基本对等的原则，中韩双方各自成立研究会，中方研究会设在原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韩方研究会设在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

“中韩经济合作研究会”的宗旨，是加强中韩两国经济合作的长期研究，将研究成果提交两国政府相关部门，供政府部门制定有关政策时参考，推动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经中韩双方理事联席会议讨论，“中韩经济合作研究会”的主要工作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不同时期中韩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实际需要，设立研究课题，各自独立地开展研究，不定期进行阶段性成果交流；二是每

年共同举办一次研讨会，就双方商议的主题进行学术交流。第一次研讨会于2003年12月在中国北京举办，自此开始，中韩经济合作研讨会每年在中韩两国轮流举行。

第七次中韩经济合作研讨会于2009年7月在中国江西省举办，会议主题为“全球金融危机及对东亚经济影响和前景展望”。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金博洙副院长率专家学者一行10人来中国参加会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陈东琪副院长率经济所、外经所、运输所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中韩两国专家围绕后危机时期亚洲经济走势判断、中韩经贸关系及未来展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格局的影响及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金融危机对中日韩贸易影响及未来展望等几个方面的专题分别作了演讲，并就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广泛的交流。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为了加强与社会的交流，与社会各界友人分享中韩经济合作研讨会的成果，我们将中韩两国专家在研讨会上的演讲稿编辑出版。由于编辑和翻译水平的限制，本书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社会各界提出批评意见，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加强中韩两国经济合作的研究，推动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2009年10月30日

序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世界性危机，它给予东亚经济以很大的冲击，既带来了“危”，也捎来了“机”。这是因为当今世界已非 70 多年前的世界，而当今的东亚更非当年的东亚。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大批粮食牛奶被倒入大海，大批企业倒闭，接踵而来的才是金融危机（银行挤兑和倒闭）。而当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近 30—40 年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金融业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迅猛发展，造成了虚拟经济的迅猛发展。这在 20 世纪 30 年代是难以想象的。据统计，2000 年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大到 160 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 30 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相当于实体经济的 5 倍。美国虚拟经济的发展，更居世界首位。据统计，2007 年美国 GDP 总量为 13.84 万亿美元，而美国股市总市值约为 17.8 万亿美元，该年美国金融机构杠杆负债率达到 GDP 的 130% 以上。这就毋怪乎这次世界危机首先爆发为金融危机，由金融危机引发实体经济的危机。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危机的传导机制也全球化，美国的金融体系渗透、传播、扩散到世界各地。于是，美国“次贷危机”扣动了“扳机”，便一发不可收拾，酿成世界性金融危机，进而引发世界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东亚更远非当年的东亚。20 世纪 30 年代，东亚

除日本属工业化列强之外，其他东亚广大地区还只是世界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不仅无经济发展可言，而且只有承受列强转嫁经济危机的份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亚许多殖民地获得政治独立，但经济上还在较长时期依赖过去的列强，特别是称霸世界的美国，当时流行一句话，只要美国经济得了“感冒”，亚洲就得“打喷嚏”。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发展中国家启动了工业化进程，推进经济独立化发展过程，不仅首先有“四小龙”经济崛起，而且有东盟推进经济区域化发展，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的和平崛起，大大改变了东亚经济的面貌。因而，在当今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中，东亚经济顶住了扑面而来的金融海啸。虽然在初期受到冲击，但包括中国和东盟十国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积极采取了反危机措施，特别是扩大了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较快地扭转了经济颓势，在2009年实现了6.3%的增长，特别是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超过了预期的8%目标。这个“亚洲速度”令世界瞩目^①。因为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经济在突破金融危机冲击中实现了稳定的增长，有力地支持了美欧等发达国家遏制经济颓势，早日复苏。可以说，在当今全球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斗争中，东亚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起了稳定剂作用，对世界作出了贡献。东亚经济的地位与作用，跟70年前大危机时期甚至跟战后初期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为什么东亚地区能在今天呈现出令世界瞩目的面貌呢？这主要是因为东亚国家与人民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利用自己赢得的政治独立，努力自主地推进工业化以发展本国经济。在几十年间，它们充分利用了历史提供的两大机遇。

一是战后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以金融业为首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起

① “亚洲速度，令世人瞩目”，《经济参考报》2009年10月22日。

来，而制造业逐渐成为劣势，向次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先是从美国向战败国日本转移，接着从美日向亚洲四小龙转移，随后进一步向中国及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东亚发展中国家抓住这个历史性机遇，承接了世界规模的产业转移，建设新工业经济体，促进了自身经济结构的变革。

二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推进地区化（或区域化）的国际经济合作。东盟发展中国家较早就建立了经济合作机制。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当今世界金融危机，更加激发了东亚国家推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愿望和努力，中、日、韩分别与东盟十国签订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而中日韩又一道要为建立三国与东盟的贸易区（10+3）而努力。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2010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启动。这个自由贸易区覆盖19亿人口，GDP总值达6万亿美元/年，贸易总额达4万亿—5万亿美元。值得提出的一点是，随着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推进，东亚地区和亚洲地区内的相互贸易发展较快，目前亚洲区域内贸易额已占到亚洲贸易总额的55%，东亚国家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相对减弱，这就使东亚地区国家增强了对当今世界金融风暴的抗拒能力，从而也进一步增强了东亚地区努力推进地区经济合作的信心与决心。

东亚区域合作远远超过了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合作范围，已扩大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特别是金融领域的货币合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是以30年大危机之后凯恩斯根据罗斯福新政实践新理论为基础提出的应对措施。二战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借助于宏观经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节手段，虽未消除周期性衰退，却使西方国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内避免了30年代大危机的再度袭击。然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只是在一国范围内实施，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各国仅致力于本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不但难以

自保，更难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到 80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从 90 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到如今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都表明一个事实：一国经济的失衡或震荡会通过传导机制的作用而传导到邻国或更远范围。这就要求有新的应对手段：区域性或全球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发达国家自 1985 年广场协议起成立了 G7 财长与央行行长每年例会机制来协调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是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G20 财长或央行行长会议就是美国为应对这次世界金融危机而发起的（参见拙作“经济全球化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及世界货币体系革新”，刊《宏观经济研究》2009 年 7 月）。如果说，G7 或 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定期会议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应对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而成立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机制，那么，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成立的东盟十国或东盟与中日韩成立的财长与央行行长定期会议，即东亚国家建立的地区性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就是为维护地区经济稳定而建立的新机制。

此外，东亚国家充分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加强金融货币合作，于 2000 年 5 月在泰国清迈召开东盟与中日韩（10+3）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签订“双边互换货币协议”，以解决区域内国际收支和流动性短缺的困难。2009 年 5 月，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给本地区造成的冲击，东盟与中日韩（10+3）进一步正式签署了总额 1200 亿美元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各参与方在其出资份额内，用其本币与美元实施兑换，为在危机冲击下遇到国际支付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东亚地区正是在多渠道、多方面的经济合作下，才能攻克时艰，不仅顶住了经济下滑的趋势，而且赢得了令世人瞩目的 6.3% 的经济增长（亚洲速度）。

正因如此，国际社会有人大谈什么“21 世纪将是亚洲的世

纪”，我认为此言过于夸张。但有一点可确信无疑，东亚地区乃至亚洲国家和人民定将不断加强地区的经济、金融合作，东亚经济乃至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将日趋增强。所谓“亚洲版 IMF”或“亚洲货币基金 CAMF”将会出现，美籍印度学者、美国亚洲经济学会（CAAES）创始人罗杰斯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杜达（Dutta）早就鼓吹“亚元”与美元与欧元相鼎立，并于 2009 年出版“亚洲经济与亚元”（Asian Economy and Asian Money）。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最近也提出“东亚共同体”的设想。2009 年 10 月 25 日东盟 10 + 6（中日韩加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峰会提出“亚洲版欧盟”的构想。尽管亚洲的情况要比欧洲复杂得多，经济一体化的道路将比欧洲一体化道路更漫长、更崎岖，但东亚地区的国家与人民势将继续在发展中加强合作，在合作中谋求加速发展，不仅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作出日益重要的贡献，而且会在世界新秩序的建设中拥有日益重要的话语权，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本书是中韩两国的两个权威机构学者的研究成果，主题是世界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以及东亚各国抗击危机的主要举措及经验，内容丰富，观点深邃，读后获益匪浅。蒙邀为该书出版写几句话，我欣然命笔，奉上短文，希望不至于成为画蛇添足之举。

黄范章
2010 年元旦

目 录

走向全面复苏的中国经济	陈东琪 / 1
全球金融危机与韩国的实物经济	李章揆 裴升彬 / 13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企业优化发展之路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建议	臧跃茹 / 32
全球性经济危机对韩国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	
及启示	李麟求 / 51
中韩经贸关系及展望	宋 泓 / 66
韩中经济交流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	李承信 / 89
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格局的影响分析及中国的	
中期发展路径选择	叶辅靖 李大伟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中东盟国家的对策和今后的展望 ...	金翰成 / 143
东亚如何长期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金融	
与经济体制	吴龙协 / 157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日韩贸易的影响分析	
与前景展望	赵晋平 / 172
全球金融危机及日本政府的应对	李炯根 / 194
中国东北陆海联运国际通道与东北亚区域	
物流发展	苏 斌 / 217

走向全面复苏的中国经济

陈东琪

内容提要：在实施“积极 + 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一揽子刺激计划后，中国经济从 2009 年二季度开始进入快速复苏，GDP 增长恢复上行趋势。针对经济内外系统中出现的新矛盾和问题，2009 年下半年的宏观调控在加快制度创新、结构转型和防范通货膨胀的基础上，着力促使经济全面复苏，实现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

1. 中国经济进入全面复苏途中

1.1 先行指标持续向上

中国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心自 2009 年春节后逐渐恢复。企业家信心指数明显上升。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在 2008 年 11 月见底（38.8）后逐月上升，但头两个月还在 50（景气度分界线）以下，3 月上升到 50 以上后持续 4 个月保持在 53 左右。工厂订单最近几个月也从 50 以下提高到 50 以上。尽管家电等制造品需求增加使过剩产能不断得以释放，但钢铁限产和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加快了去库存化进程，二季度各月企业库存数量逐月减少。库存构成中，被迫性存货减少，主动性存货增加。工业产成品占用金增速从 2008 年 11 月的 25% 以上降到目前的 10% 以下。这些先行指标持续向上，表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景气度持续向好。

1.2 货币信贷高速增长

货币供应量方面，M2 增速在 2008 年 11 月降到本轮调整最低的 14.8% 后，连续 6 个月加速上行，2009 年 5 月达到 25.7%。M1 增速见底晚一些，但加速度更大，从 2009 年 1 月的 6.7% 加速到 5 月的 18.7%。目前两个指标的增速，均高于 1997—2007 年各年的水平。信贷方面，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长，从 2008 年 10 月的 14.6% 提高到 2009 年 4 月、5 月的 29.8% 和 29.7%，其绝对增速仅低于 1984—1986 年平均 31.7% 的水平，属于超常规增长。从数量看，1—6 月累计新增贷款完成 6.8 万亿元，比 2008 年全年的 4.9 万亿元高 38%，已经超过《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全年新增贷款计划“5 万亿元以上”的规模。

1.3 国内需求不断扩大

2009 年以来，外需急剧收缩，中国的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由进口减速快于出口减速带来的顺差，1—5 月月均 170 多亿美元，比 2008 年同期月均 220 亿美元减少 23% 以上，这对 GDP 增长形成巨大的下拉力量。但是，由投资和消费构成的内需高速增长。投资方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头 5 个月累计增长 34.8%（考虑投资品价格下降因素，实际增长达到 40% 左右）。这个增速，比长期平均增速（1982—2008 年为 21%）要高出 66%。消费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在 4 月高位触底（14.7%）后出现加速趋势，5 月、6 月分别为 14.8% 和 15.2%（考虑 CPI 上涨 -0.9%，实际增速超过 16%），明显高于长期平均增长（1979—2008 年为 15.2%）的水平。2009 年以来消费品市场出现全面转暖，汽车、家电、装饰材料、旅游和餐饮等市场持续旺盛，城、乡两个市场都很活跃，这是多年来少有的情况。

1.4 主要市场全面活跃

一是资本市场上涨。上证指数于2008年10月下旬在1600多点位置触底后,已持续8个多月上升,2009年6月底接近3000点,累计升幅超过80%。有色金属、农产品等商品的期货市场也出现了连续几个月上升的势头。股市、期货市场持续活跃,表明投资者信心全面恢复,市场的悲观预期转为乐观预期。这是总体经济全面复苏的晴雨表。

二是汽车市场兴旺。这次全球危机,虽然对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头两个月中国汽车产销有显著影响,但没有改变自加入WTO以来汽车进入居民家庭的总趋势。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汽车,2001年0.6辆,2005年增加到3.4辆,年均增加0.7辆;2008年增至8.8辆,年均增加1.8辆。2009年以来,中国对汽车购置实行了减税、补贴等刺激措施,城乡居民买车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汽车市场逐渐活跃,汽车销量逐月增加,在全球汽车销量排名中连续5个月排名第一。1—2月月均销售80多万辆,3—5月月均销售110万辆以上。买车族从城市延伸到农村,城市从高收入家庭延伸到中收入家庭。新趋势显示,本轮汽车消费浪潮将强于2002—2007年那一次。

三是房地产市场转暖。全国70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的同比上涨率,从2008年12月到2009年5月连续6个月负增长,但4、5月负值变小,环比出现了连续2个月正值。由于房屋存量较大,“去库存化”还需要时间,但近两个月各地住房销售量快速增加,部分城市房价的环比出现明显上升。从最新趋势看,全国房价同比负增长有可能在第三季度结束,市场总体上逐步恢复到“雷曼破产”前的常规水平。在刚性消费需求回升之后投资性需求逐渐增加,库存逐渐减少,房价止跌回升的城市数量将增加,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复苏转为全面复苏,将促使总体经济

快速复苏。

四是家电、文化和旅游市场活跃。在“家电下乡”等政策刺激下，各类家电销售看好，特别是农民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脑等耐用消费品的积极性高涨，政府实施“以旧换新”的新政策后对家电市场产生新的刺激。电信、文化、体育用品市场 2009 年 3 月以来也出现快速增长势头，电影院票房收入增长加快。虽然出境游和入境游遭受到金融危机和最近甲型 H1N1 流感的影响，但国内旅游市场依然比较活跃。

1.5 工业生产明显复苏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增长，2009 年头两个月达到本轮调整最低的 3.8% 后，3、4、5 月份提高到 8.3%、7.3% 和 8.9%，估计 6 月再次恢复到“两位数”。这表明，工业生产已经走出低谷，进入明显复苏阶段。在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原材料及工程机械工业的需求的新背景下，东南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城市扭转了工业大幅下滑的趋势，受全球危机影响最大的两个“三角”（珠三角和长三角）2009 年二季度以来逐步恢复增长。1—5 月，江苏和广东分别为 11.7% 和 3.1%，比 1—4 月高 0.4 和 1 个百分点。浙江从 4 月的 0.2% 提高到 5 月的 3%。工业投资 1—5 月的增速，江苏达到 25.1%，浙江实现了 5.7%，上海也实现了 0.1%。6 月上旬工业用电由负转正，两个“三角”6 月以后的工业增长将继续加速。中西部地区工业增长 2009 年以来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占国民总产出 43% 左右的工业复苏，必然促使总体经济复苏。

1.6 总量增长触底回升

2009 年一季度 GDP 的增速虽然只有 6.1%，比 2008 年四季度的 6.8% 回落 0.7 个百分点，但降幅比四季度收敛 1.5 个百分

点。作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结果性指标的财政收入，1—5 月累计增长 -6.7%，而其中的 5 月份转为增长 4.8%，这是国民经济转向全面复苏的重要标志之一。

根据总需求模型中少数变量回升到所有变量回升的趋势进行综合分析，2009 年二、三季度 GDP 的增速分别达到 7.1%、7.7%，四季度有可能接近 10%，全年可获得 8.2% 或略高的增长业绩，明显高于世界银行最近预计的 7.2%。中国经济增长从 2007 年二季度到 2009 年一季度走完了“V”的左边，第二季度转入“V”的右边。之后如何走，取决于进一步的政策措施和措施执行的情况，但趋势变化规律显示，一旦新趋势出现，这个趋势就会保持较长时间的惯性，随着新需求增加，这个上升趋势会被不断强化，进入新一轮加速上行的增长轨道。

1.7 经济结构趋向改善

本次全球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结构调整机遇。由于中国政府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转型”的方针，在采取措施扭转经济下滑趋势、尽快恢复上行趋势的同时，出台了力度很大的调结构、促转型的政策措施，所以 2009 年以来的中国经济结构出现了新的积极变化。

一是需求结构改善。出口两位数负增长，消费和投资的名义增长分别为 15% 和 35% 左右，表明外需占总需求的比重下降，而内需占比提高，经济增长成果中较多份额用到国民福利改善而不是单纯增加外汇储备上。在投资和消费关系中，除了城乡居民的私人消费保持快速增长外，公共消费领域和准公共消费领域的投资比重提高，公共交通、城市公用事业以及学校、医院、养老院和其他民生性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和生产加快。在增加私人消费同时，增加更多的公共消费品供给，有利于全面改善投资与消

费的关系。

二是产业结构改善。在社会总投资中，一般加工工业投资所占比重下降，农业、农村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所占比重提高，特别是对经济持续增长构成“短板”的铁路、城市地铁、农村公路、农田水利和环境治理等领域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产业和行业中，一般工业的增长速度降低，金融商贸、教科文卫等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提高；“两高一资”行业占比下降，信息、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等低能耗、高技术的行业开始出现加快发展趋势。这些新的结构变化，为解释1—5月工业增长而用电下降的“背离”现象，提供了基本答案。

三是区域结构改善。本次经济快速触底回升的主要动力，是中西部地区和前期发展相对滞后的部分东部地区。2009年前4个月，珠三角、长三角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增长还在历史低位徘徊，有的地方如东莞还没有走出负增长区间，但中西部地区投资和贸易活跃，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一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9.8%、34.3%和46.1%，中西部明显快于东部，其中有的西部省份接近60%。1—4月，中西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47.4%，同比加速3.2个百分点。从GDP增速看，除天津（16%）外，排在前五位的都是中西部省区，几乎全部达到两位数增长水平。从财政收入看，中西部的增速快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全国1—4月同比增长-8.3%（4月为-13.6%），广西北部湾地区达到12.8%。东部经济增长减速时中西部经济加速，出现区域经济“景气交叉”，可减缓总体经济下滑趋势。在东部的出口减少、产业转移加快和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中西部经济增长加速，既有利于缓解东、中、西部差距扩大趋势，逐步实现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向区域协调发展转变，又有利于扩大内需，加快国民经济触底回升，因为中西部